
新乡贤制度与农村基层治理:梁寨样本

王红艳¹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北京 100028)

【摘要】:自2015年以来,由于自身的内在需要,以及人力资源、社会基础、国家政策鼓励等客观条件的具备,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梁寨镇在全镇范围内启动了新乡贤制度的探索。由于选拔比较严格、管理趋向规范、制度相对健全,统筹措施到位,该制度的实践为促进镇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提效农村基层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未来相关探索给出了有益启示。这些启示主要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新乡贤制度建设的原则,规范选拔和管理是推进新乡贤制度建设的关键,提高农村基层治理成效必须善用社会-行政资源,优化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必须践行“互嵌式发展、体系化推进”理念。当然,“梁寨样本”也有它的局限和不足,对此我们应该进行深刻反思,并及时给予弥补或加以纠正。

【关键词】:新乡贤 农村基层治理 梁寨经验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170(2017)04-0008-07

所谓乡贤,即生于其乡,而众人共称其贤者。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社会中,乡贤群体或以学问文章、或以清明善政、或以道德品行等赢得乡邑百姓的高度认同和效仿,他们在保持一定独立性的基础上,扮演了加强民众和政府之间的沟通、协助政府实施基层治理的角色,形成了众所周知的植根乡野、兴盛基层的“乡绅之治”^[1]。这种治理方式,在传统社会时期,为平衡国家权力、促进基层自治、节约行政成本、创造社会财富、构筑乡绅文化和凝聚乡村力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

近年来,尤其是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即《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纲要》)发布以来,全国各地涌现了不少关于新乡贤的实践。新乡贤探索方兴未艾。2017年3月中旬,笔者作为“基层治理与民主建设”课题组成员前往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梁寨镇就新乡贤制度在当地的实践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将该地经验和有关思考整理如下^[3]。

一、新乡贤的产生:必要性和可能性

为何要践行新乡贤制度?

一种流行的解释是:伴随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的推进,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乡村社会精英持续流失,农村基层出现了空壳化、文化荒漠化等一系列问题,逐步失去了足以实施自治和促进发展的内在力量,以至于一切外部援助都无法转化为其自身的内在的勃勃生机。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等多项政策的深入推进、中央和地方政府涉农惠农强农专项资金投入的不断增加,以及乡村制度建设的日渐完善,并未真正将村民动员起来,使村庄发生向好的质变,相反,村庄仍处于“一盘散沙”状态,有的甚至出现恶化迹象。而新乡贤制度,作为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和推动乡土社会重建的固本培元之计,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之策^[4]。

作者简介:王红艳,女,湖南邵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这种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普遍性。具体到梁寨的情况又是怎样?2015 年之前,梁寨镇各村即成立了以“大佬知”(方言,指村里组织和操办红白喜事等大事的人)为主体成员的“老年协会”。“老年协会”为村域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不小作用。2015 年 6 月,该镇在“老年协会”成员基础上,推选一批新乡贤,成立新乡贤会,制定了一套工作制度,尝试在全镇范围内推行新乡贤制度。

之所以这么做,用梁寨镇现任镇党委书记王磊的话来说:是因为“有些事镇干部、村干部干不了”。具体而言,移风易俗之类的工作(包括丧事葬礼上披麻戴孝等),因其根深蒂固和牵涉甚广,镇干部、村干部(尤其是后者)难以做好;家长里短、邻里纠纷等矛盾的调处,因其微妙性和复杂性,镇干部、村干部(尤其是前者)难以做好;邪教组织的侦查、邪教门徒的劝服教育工作,因其隐蔽性和隐私性,镇干部、村干部难以做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抄家造反”等行为、计划经济时期的“刮宫引产”等行为,因熟人社会流动较差以及由此导致的矛盾消解缓慢,身处相同社会网络的镇干部、村干部,如果工作涉及“仇家”是难以做好的^[5],甚至是不便出面的。

除了上述种种“干不了”,从数量和结构上看,“村两委”也是难以完成整个村庄的治理任务的。目前,梁寨镇一个行政村的“两委”班子成员合计六、七人,从人手上看,光是完成上级下达的“数不胜数”的行政任务已是“力不从心”。此其一。其二,这些行政村基本是由原来的几个(一般是三个)行政村合并而成,也就是说,原来的行政村每村只有一两人能进入班子,绝大多数自然村基本不可能有代表进入行政村“两委”班子,村民小组长又是“势单力孤、基本无所作为”,而自然村是村民生产生活的主要场域,治理真空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其三,“村两委”班子成员毋庸置疑地是各个“大姓”家族的利益代表,在一些问题上很多时候实际上是难以达成共识的,因而影响了村庄经济社会的整体推进和发展。

由于上述原因,加之梁寨外出打工村民占不小比例,村级运转经费和会议场地有限,村民大会甚或村民代表大会难以召开,而村民又需组织起来实施和加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于是作为新型村民自治组织的新乡贤会在梁寨便应运而生。

推行新乡贤制度何以可能?

一是乡村精英的“现身”。如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梁寨近年来出现了一些退休回乡贤达即回归型乡贤,他们中既有基层官员,也有知识分子,还有国企工人。与此同时,梁寨近年来还涌现了一批扎根本土为乡人所推崇和敬重的自源型乡贤,包括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新乡贤推选结果显示,梁寨新乡贤中“吃计划的”(指的是退休回家的)占比为 10%,曾经担任过“村两委”干部的占比超过 50%,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的村民占比将近 40%。此外,他们中从年龄来看,年龄在 60 岁左右的居多,年龄最大的超过 80 岁;从政治面貌来看,中共党员超过 50%;从文化程度来看,初中以下学历人数占比 20%,初中学历占比 30%,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合计占比 30%。这些乡村精英的出现和发展,是推行新乡贤制度的人力资源保障。

为什么这些精英在此时“现身”梁寨?就回归型乡贤而言,主要是因为“落叶归根”“故土难舍”情结推动着退休贤达回归故里;其次是因为近年来城市环境破坏严重、各种污染不断加重,推动着退休贤达另寻他处颐养天年;再次是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综合差距缩小,逆城市化初见端倪,加之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建设效果逐步显现,吸引着退休贤达回归故里。调研发现,梁寨目前正在依托景区打造乡土文化,依托历史人物挖掘历史文化,融合现代文明,建立健全公共文化体系,努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千年古镇文化”。就自源型乡贤而言,主要是因为梁寨近年来非常重视本土精英的挖掘和培育工作。该镇认真组织开展了“双善双争”即“善待百姓,争做优秀党员;善待他人,争做梁寨好人”活动,不但拓展和深化了“两学一做”活动,而且加大了对治理主体的培育力度。其中每年一次的“梁寨好人”“梁寨好婆婆”“梁寨好儿媳”评选活动已经连续举行了 4 年,合计出现 240 名梁寨道德模范。这些道德模范评选活动毫无疑问充当了自源型乡贤产生和成长的机制。

二是熟人社会特征的保有。尽管历经千年巨变,我国传统社会的架构并没完全坍塌,尽管历经近 40 年的改革开放,以城市化、工业化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但是包括梁寨在内的很多农村地区仍然保有一定的熟人社会特征,仍然习惯于基于血缘和(或)地缘关系通过“内部化机制”形成“自己人认同”,人情、面子、信任与习俗规则仍然是圈子内部沟通、交往和行动的

依据,也正因为如此,以乡贤为中心的心理认同仍然存在于广大农村地区^[6]。熟人社会特征的保有,是推行新乡贤制度的社会基础。

三是国家政策的推动。2014年9月12-13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会上肯定了乡贤文化,认为“乡贤文化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7]。2015年2月1日,中央“一号文件”在部署如何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时强调:“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8]。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4个月之后,梁寨正式启动了新乡贤制度的探索。2016年3月17日,《十三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该纲要在“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一节中提出:“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深入开展‘星级文明户’、‘五好文明家庭’等创建活动,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9]。至此,包括梁寨在内的不少地方政府更是加大了探索新乡贤制度的力度。中央政策和有关精神,是推行新乡贤制度的政治保障。

二、新乡贤制度的实践:主要做法和初步成效

梁寨推选、管理和运用新乡贤的主要做法包括:

首先,严格推选标准和程序。一方面,严格推选标准。全镇范围内所执行的新乡贤标准主要包括:坚持党的领导,自愿奉献乡里并得到家人支持,品行好威信高,办事公道,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另一方面,严格推选程序。推选程序主要包括:本人向所在行政村党组织提交“参选”新乡贤的申请,党组织向镇乡贤工作指导委员会推荐新乡贤候选人,镇乡贤工作指导委员会到新乡贤候选人所在村征集村民对新乡贤候选人的意见,镇乡贤工作指导委员会将对新乡贤候选人考察情况汇总报送镇党委,镇党委确认新乡贤名单,“当选”新乡贤与镇乡贤工作指导委员会签署承诺书。根据上述标准和程序,2016年6月,梁寨镇从357名“大佬知”中推选、确认了102名新乡贤。2017年初,该镇又推选一批新乡贤,新乡贤总数增至143名,其中出现了部分女性新乡贤。

其次,规范群体管理工作。一是统一工作服装。新乡贤在工作时间必须统一着唐装。二是统一群体标记。有关部门设计和制定了全镇通用的新乡贤logo。三是统一工作编号。对全镇范围内新乡贤进行编号,每位新乡贤终身享有一个编号,他人不得重复使用。四是统一将新乡贤名字镌刻于石碑之上。全镇范围内的新乡贤的名字及其主要事迹都将勒于石上、以传后世。这些做法为营造新乡贤群体的群体认同感、荣誉感和使命感发挥了有效作用。

第三,加强工作制度建设。一是建立工作架构。镇里设新乡贤工作指导委员会,负责指导和管理全镇范围内的新乡贤工作。每个行政村设新乡贤工作室,负责全村范围内的有关工作。一般每个行政村配有七、八名新乡贤,最大的行政村配有11名新乡贤。二是建立值班制度。各村新乡贤工作室每天安排一名新乡贤值班。三是建立片区例会制度。镇党委书记每个季度分片区召集召开新乡贤工作会议,引导新乡贤分享工作经验,诊断工作中遇到的复杂个案和难题。四是建立工作经费保障制度。镇里每年在财政预算里安排2万元支持镇乡贤工作指导委员会开展工作。此外,镇党委还会在适当的时候号召社会力量向镇乡贤工作指导委员会捐赠工作经费。

最后,统筹运用五种资源。镇里按照“五位一体”即五种治理主体有机统一的理念,将新乡贤、全镇的干部(共计48人)、全镇的党员(共计1678名,其中农村党员1301名,农村党组织20个)、行政村的干部(共计100多,每村5-7人)、“梁寨好人”(截至目前共计240人)五种人才资源整合起来加以使用。其中,为了加强镇机关干部与新乡贤以及其他人才队伍和普通群众的联系与合作,充分发挥镇机关干部的应有作用,梁寨将全镇机关干部分配到20个行政村并要求他们定点“包挂”一定户数村民(全镇共计15730户村民),同时,推出“一卡”“一记”“一车”“一网”等工作制度。镇机关干部定点“包挂”农户规定与这四项工作制度共同构成了“走村串户工作法”。

“一卡”指的是“便民服务明白卡”。该卡正面印着镇政府公开服务热线电话、廉政举报电话以及镇领导班子成员分工情况和联系方式,背面印着“深入群众解民忧,管好小事帮大忙”的字样,设有“梁寨镇便民服务车入村服务时间表”“镇部门办事指南”两个栏目。卡片由镇里统一印制后发放到全镇每个群众手里,群众遇到任何问题和困难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咨询和求

助。

“一记”指的是“民情日记”。每名镇机关干部走村串户时必须随身携带民情日记本,及时记录、整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定期将它们报告给镇党委和镇政府,为镇党委、政府进行科学民主决策提供参考信息和依据。

“一车”指的是“流动便民服务车”。该镇每月 1-20 日都派出“流动便民服务车”到全镇各村巡回办公,随车服务队员要求及时受理服务事项,限时办结服务内容,按时反馈办理结果,第一时间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矛盾调解、政策宣讲、缴费充值等问题。

“一网”指的是“电子信息服务网”。该镇建立了民情信息动态管理服务系统,开发了法律政策、民情简报、活动新闻、办理反馈以及全镇农户基本信息等模块。每名镇机关干部都拥有一个独立的网络账号,他们负责在走村串户基础上建立所联系农户基本情况的电子档案,上传民情日记、工作心得和调研报告等^[10]。

由于推选、管理工作到位,当前梁寨新乡贤正活跃在全镇农村各个角落,为镇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基层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中有的成为“普法达人”,充当了农村普法的骨干力量;有的成为远近有名的“和事佬”,有效化解了不少家庭矛盾和邻里纠纷^[11];有的带领村民将村边土地所种杂木拔掉后种上了苔蒜,增加了村民收入;有的组织村民对村里的废坑废塘进行整治,拓展了 700 多亩建设用地。更值得注意的是,全镇范围内出现了“文明新风扑面而来,社会风气逐步向好”的良好局面。村民普遍踊跃捐资,热情参与捐植认养“百姓林”、捐立中国“二十四孝”雕塑、捐资修建公厕、捐助美丽乡村建设等家园共建活动,甚至连原本臭名远扬的“街溜子”(方言,指街上的“混混”)也捐资在镇上修建了一所公厕,成就了一段“浪子回头金不换”的佳话。五年来,全镇各项群众自愿捐款达 3300 多万元,且未出现一例进京非正常上访、闹访和缠访事件。

三、新乡贤制度与农村基层治理:梁寨样本的价值与局限

由于农村基层治理事务微妙复杂、治理任务艰巨、治理主体不但人手不够而且“先天不足”,以及乡村精英的“现身”、熟人社会特征的保有和国家政策的鼓励,梁寨推行了新乡贤制度。制度实施以来,梁寨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和基层治理获益良多。当然,梁寨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广东省云浮市乡贤理事会^[12]、广东省清远市九龙镇乡贤理事会^[13]、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乡贤协商会^[14]、浙江省嵊州市竹溪乡乡贤参事会^[15]等都是近年来涌现的类似探索。此外,贵州省思南县^[16]、铜仁市^[17]、印江自治县^[18]还启动了关于“村两委+乡贤会”乡村治理模式的探索。不过,从文献研究和多点实地调研情况来看,梁寨的实践也有其独特价值。这些独特价值不仅是该镇的成功秘诀,也为其他地区开展相关探索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梁寨实践给出的启示,既有涉及新乡贤制度本身建设的,也有涉及新乡贤制度与农村基层治理的,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新乡贤制度建设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政治优势。而坚持党的领导,不但要体现在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上,还要体现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上,并落实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军队、祖国统一、外交、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换言之,坚持党的领导,既是我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也是我们开展各项工作的基本准则和具体要求。

新乡贤制度建设这项工作当然也不例外。从推选程序、工作制度设置和实施等情况来看,梁寨在新乡贤制度建设中贯彻坚持党的领导原则。梁寨镇党委的做法展现了较强的政治自觉,值得肯定和推介。不过,在未来新乡贤工作实践过程中,梁寨镇党委,当然也包括其他地区的党组织,还需继续努力,积极探索实现党的领导的有效方式,以及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的具体路径和办法,同时处理好党组织与作为新型村民自治组织的新乡贤之间的关系,既要践行“组织覆盖、工作覆盖”的原则,又要力避

(相互)包办、取代等错误偏向。

事实上,坚持党的领导也是新乡贤制度的“新”的表现之一,而且可能是最根本的“新意”。传统乡贤制度是“皇权不下县”之传统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社会自治制度,具有较强的救济性、独立性和主体的单一性等特点。新乡贤制度则是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尽管也具有一定的补位性特点,但是,对“一核多元”模式的坚持,对党社融合、政社互动的憧憬,对党的领导、政府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有机对接的追求,是它与前者的本质区别。

(二)规范选拔和管理是推进新乡贤制度建设的关键

新乡贤群体和新乡贤文化的出现,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而且,大约在2014年之前,新乡贤只是“星星之火”,散布在少数乡村的角落,并没有形成规模。自2014年以来,由于国家政策的鼓励以及其他正向激励因素的作用,新乡贤个体数量不断增加,新乡贤群体组织逐渐增多。但是,截至当前,新乡贤还存在界定标准不统一、认定主体不明确、组织化程度不高、管理过程不规范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但影响了新乡贤群体的整体形象,而且影响了新乡贤群体更好地发挥作用。

管理出效益,规范提品质。梁寨新乡贤制度的实施之所以取得良好成效,正是因为该镇在提高新乡贤选拔和管理规范化程度方面做出了切实努力。如前所述,该镇不但统一了新乡贤推选标准、推选程序、认定部门,还统一了新乡贤工作服装、群体标记、工作编号、工作架构,严格执行了将新乡贤名字镌刻于石碑之上的制度、值班制度以及片区例会制度。这些具体做法对于规范新乡贤选拔和管理工作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不过,就全国范围而言,新乡贤是否必须统一推选标准和程序,是否必须统一认定主体和工作制度,是一个有待继续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从各地了解到的情况看,当前的局面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坚持党的领导,不断提高管理的规范化程度和科学化水平,是任何地区、单位和组织推进新乡贤制度建设必须遵从的原则和要求。

(三)提高农村基层治理成效必须善用社会-行政资源

社会-行政资源指的是兼具社会性和行政性特征的资源。从理论上讲,在农村基层治理中,一方面,因“官本位”文化的根深蒂固,仅仅依赖社会资源治理效果会打折扣,另一方面,因熟人社会的特征,仅仅依赖行政资源治理效果也会打折扣,而惟有善于开发和利用社会-行政资源,才能大幅快速提升治理的整体成效。

新乡贤是一个同时拥有社会资源和行政资源的群体,或者说,新乡贤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政资源。一方面,新乡贤尤其是回归型乡贤和自源型乡贤中曾担任过村干部的乡贤,与上级党政部门有着密切的联系,拥有不同程度的行政资源;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新乡贤都是本土人士,与生活在村庄的人们有着密切的联系,拥有不同程度的社会资源。那么,根据上面的逻辑进行推演,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善用新乡贤势必事半功倍。从梁寨调研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该镇近年来经济社会保持向好发展与选好用好新乡贤的确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

那么,新乡贤是怎样收获事半功倍效果的呢?这是因为,它所拥有的行政资源,有助于加强村庄与外部的沟通和交流,有利于各类资源进行纵向整合,为落实“上-下”和“内-外”联动创造了条件;而它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有助于激活村庄内生力量,有利于各类资源进行横向整合,为落实村民自治奠定了基础。而一旦两种路径相加使用,一旦各类资源进行纵横整合,实际上是从根本上改进了权力配置方式和运作机制。这种改进,通过提高治理体系的科学化水平,实现了增强治理体系综合能力以及提升整体治理成效的目标。善用社会-行政资源,善用新乡贤,对于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的确意义非凡。

(四)优化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必须践行“互嵌式发展、体系化推进”理念

梁寨样本的另一价值可能在于它初步找到了如何优化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路子。多地实践表明,新乡贤在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确实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有观点甚至认为,乡贤正是中华民族最基层的治理末梢,是社会不断变化中那根不变的“定海神针”,具有“黏合剂”“转换器”“安全阀”等多重功能^[19]。梁寨本身也初步尝到了推行新乡贤制度的甜头。但是,梁寨一是没有无限夸大新乡贤的作用,二是(因此)没有相信“一招治天下”的故事,三是(因此)没有止步于新乡贤的探索,满足于“一枝独秀”的风景,而是对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实施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手术”。

如前所述,梁寨的具体做法是:将新乡贤、全镇的机关干部、全镇的党员、所有行政村的干部、全镇的“梁寨好人”五种人力资源整合起来加以使用,并在全镇机关干部中实施了以“一卡”“一记”“一车”“一网”为主要内容和核心制度的“走村串户工作法”,在全镇党员和普通群众中开展了“双善双争”活动。这套做法,整合力度之大,牵涉领域之广,不但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从总体上表达了“互嵌式发展、体系化推进”的主张和努力。这套做法,为提效梁寨农村基层治理切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五类治理主体,是否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形成了有机对接、分工协作、各展所长、相互促进的格局,换言之,是否既“统起来”了也“串起来”了,新乡贤工作室与村庄内部其他治理机构,包括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村民自治组织,是否形成了规范、畅通和高效的合作机制,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不过,梁寨实践再次表明,“互嵌式发展、体系化推进”是我们优化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必须践行的理念,任何只谋一时、一事、一域而不谋全局的做法都是不可取、行不通的。

当然,梁寨样本也有它的局限性。

例如,以党政力量强力推进新乡贤制度建设,使新乡贤个体数量在短期内实现激增(可能有违“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成熟一批发展一批”精神),为每个村庄“配备”一定数量的新乡贤(可能有违新乡贤发展不平衡、分布不均匀的事实),一方面,显现了梁寨镇党委的工作魄力,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存在未完全按照事物发展规律办事的倾向。

再例如,与山东新泰“平安协会”、青海环仓秀麻村“德瓦尕宝”(藏语,意为“村里有威望的老人”)队伍等地方专心调处邻里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不同^[20],梁寨不但“要求”新乡贤工作室履行推进依法治村、调解邻里纠纷、促进经济发展、倡导文明新风等职能,而且还赋予其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改善党群关系、优化党的形象的期望。从理论上讲,这种“全能”设计理念无可厚非,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不但增加了对新乡贤工作评比和管理等相关工作,而且能否真正做到“全能”,值得商榷。

新乡贤到底应该怎样定位?政府要求这一群体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学者希望这一群体在重建乡土社会、促进村民自治、打通传统与现代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各种定位,见仁见智。不过,无论哪种角色期待都对新乡贤群体提出了挑战。这一群体目前的能力素质显然是难以胜任时代赋予他们的责任和使命的,尽管他们位列精英群体。而这一群体的能力素质深刻影响农村基层治理整体成效,(甚至)直接决定新乡贤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加强新乡贤群体的教育培训工作,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梁寨可能尚未真正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们在推进和“全能”定位新乡贤的情况下,并未就加强新乡贤群体的教育培训工作作出相应的专门的规划部署,只采取一些“以会代训”的做法。这是梁寨样本的另一局限。当然,这一局限并非梁寨所独有,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表现。因此,梁寨经验为探索新乡贤制度建设路径,以及寻找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优化和绩效提升方案作出了新贡献,其存在的不足也需要注意和研究。

参考文献:

[1]钱念孙:《乡贤文化为什么与我们渐行渐远》,《群言》,2016年第4期。

[2]秦德君等:《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非行政化启示》,《党政研究》,2016年第3期。

[3]梁寨镇位于江苏省徐州市西北部,是中国最大的芦笋、牛蒡、山药、苔蒜等特种蔬菜生产基地。该镇现有行政村20个,户籍人口6万多。2016年全镇财政总收入1.7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1.5万元。本文中未注明出处的数据资料均来自这次梁寨调研。

[4]胡彬彬:《培育当代乡贤重建乡土社会》,《社会治理》,2016年第2期;季中扬等:《当代乡村建设中乡贤文化自觉与践行路径》,《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袁方成等:《从“乡闲”到“乡贤”乡村人才资源开发的地方实践与借鉴价值》,《国家治理》,2016年第6期。

[5]早些年间,梁寨一带邪教势力有所抬头,蒙头会、呼喊派等邪教组织在一些村庄开设了分会或聚会点,发展了一些信徒。这些邪教组织尽管没形成气候但影响极坏。调研了解到,某村一名在外担任建筑队“包工头”的男士,每年往家里寄回数十万元,但其妻因为被蒙头教所迷惑,不但向当地分会捐献了100万元,还将自己的贞洁献给了分会执事,最后听从“主”的召唤以自杀形式实现救赎,导致家破人亡。

[6]张颐武:《乡贤是我们走向世界的守望者》,《解放日报》,2015年7月3日。

[7]刘奇葆:《创新发展乡贤文化》,人民网,2014年9月16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916/c1024-25672886.html>。

[8]《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全文)》,人民网,2015年2月3日,<http://ah.people.com.cn/n/2015/0203/c229939-23769035.html>。

[9]《十三五规划纲要(全文)》,新华网,2016年3月18日,http://www.sh.xinhuanet.com/2016-03/18/c_135200400_3.htm。

[10]值得注意的是,徐州市借鉴梁寨镇“走村串户法”,自2017年起在全市全面展开“联百镇、进千村、入万户”集中走访帮扶活动。

[11]据现任梁寨镇党委书记介绍,农村矛盾中60%可以解决,20%可以达成谅解,20%属于无理诉求而难以根本解决。而可以达成谅解的20%部分正是新乡贤发挥作用的空间。

[12]徐晓全:《新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机制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4期。

[13]孙敏:《乡贤理事会的组织特征及其治理机制——基于清远市农村乡贤理事会的考察》,《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14]林芊等:《聚力创建乡贤协商会打造乡村治理新模式——以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探索乡贤协商工作为例》,《今日海南》,2016年第12期。

[15]康静思等:《乡贤参事会及其在乡村协商民主中的价值分析——以浙江省嵊州市竹溪乡乡贤参事会为例》,《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16]王青等:《贵州思南县:“乡贤会”唱响乡村治理“协奏曲”》,《党建》,2016年第12期。

[17]何建成等:《创新驱动激发基层发展新活力——铜仁市探索推行“村两委+乡贤会”乡村治理模式》,《当代贵州》,2016年第47期。

[18]李汉华等:《群贤共治疏通农村发展“组织末梢”》,《理论与当代》,2016年第2期。

[19]张颐武:《乡贤是我们走向世界的守望者》,《解放日报》,2015年7月3日。

[20]笔者于2013年、2015年前往山东新泰就“平安协会”进行了专题调研,于2016年前往青海刚察县哈尔盖镇环仓秀麻村对“德瓦尕宝”队伍进行了专题调研。